

可能消失的地摊黄瓜

林少华

东北,乡下。暑期依旧回乡,“五一”回来一次,回来种瓜,主要种黄瓜。往年大弟种,今年自己种。也可能是时隔半个多世纪没种的关系,我种的黄瓜“罢园”(休架)早。暑期回来没吃上一个半月就不灵了。叶越来越黄,花越开越稀,瓜越来越小、越来越弯,这几天弯成了月牙。月牙挂在天上自是赏心悦目,而挂在黄瓜架上就两回事了,一副苟延残喘的样子,不好看,不好吃。不可黄瓜是我家主菜——据说有减肥功效,家人非吃不可,甚至早餐只吃黄瓜。抓起一根就咔嚓一口,声声悦耳,虎虎生威。

于是我去赶集。农历逢五逢十小镇有集。不是多么红火的集。篮球场大小的沙土地上稀稀拉拉大一摊小一摊。赶集的人也不多,稀稀拉拉前一个后一个。卖黄瓜的有两三摊,直接摊在地上。我在一个摊前停下。摊主是年纪和我不相上下的老者。的确够老的,脸上全是皱纹,换个不礼貌的说法,仿佛全世界所有的皱纹都来他脸上集训。身材相当瘦小,

直接坐在沙土地面。摊不大,摊着十来根黄瓜。我看好水灵灵光嫩嫩的三条。多少钱?“一块!”他说。一块太不好意思了,两块吧!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。他则几乎条件反射地随手抓起一根大的加上——他有他的不好意思。

拎回家,家人马上洗了洗咔嚓一口:“脆生生的,够味儿,太够味儿了!”没吃的我也闻到味了,那是黄瓜刚下来时候的味儿、初夏的味儿,而立秋后还能有这样的味儿,不容易。老人怎么种出来的呢?家人说青岛一家合资大超市也有标有“有机”字样的黄瓜,用保鲜膜封在泡沫塑料盒里,两条15.60元。还不好吃,切成片做色拉也硬邦邦的,和这个没法比!价格更没法比:两条15.60元;三条1元——说虚乎些,这个世界怎么了?是的,1元,真的是一块钱。我的不好意思也是真的。你想,我一个月退休金不止一万,怎么好意思用一块钱从乡亲手里买东西呢?何况是年纪和我相仿的乡亲。究其实,与其说是想多给他一块钱,莫如说是为了平衡自己的心情。再说玄乎些,为了把自己心情的钟摆多少调到合适的位置。

不大工夫,我的一个妹夫来访,我问集上摆摊的人是不是有的只是为了找乐子?比如家里孤单,想出来和大家说说说话什么的?“哪里,那是人家的生计……”倒也是啊,毕竟不是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卖黄瓜,有什么乐子好找呢?说话?有什么话非脑门儿顶着大太阳说不可?生计!生计!

城里还有一块钱的生计、一块钱的生意吗?据我所知,如今城里好像没有谁把一块钱当一回事。别说大超市,即使小便利店,也少有标价1元的商品。我接触一块钱的生意,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学校后门道旁还有报刊亭,因家里煤气灶一下子打不着火,我去那里买打火机。“一块!”我掏出一枚一元硬币。“算啦,拿去用吧!你总来买报纸,这回算我送你的!”摊主当年是吉林四平郊区的生产队长,我叫他刘队长。时过不久,报刊亭消失了,刘队长消失了,一块钱生意也消失了……

说回地摊一块钱的黄瓜。我忽然心想,漫说一块钱生意会消失,地摊黄瓜也可能消失——时下在农村集上摆摊卖自家园子黄瓜的,几乎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妪老翁,他们不在以后,谁还会继续卖呢?甚至,谁还会这么种这黄瓜呢?他们的子女早进城了,他们的孙子生在城里长在城里。我敢担保,他们的儿孙们绝无可能回来种什么黄瓜,也不会种。

唔,也许这是最后的黄瓜。下次赶集得多买几根留着——用保鲜膜封在泡沫塑料盒里放进电冰箱冷藏起来……

那几位地质师,我一直景仰。在我青春的记忆里,常常出现他们的身影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我被调入大庆油田知青办工作。我们的办公室,与油田地质处同在一座红砖平房里,每天与这些油田顶级的地质师从一个大门进进出出。他们大多毕业于名校,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从全国各个油田来参加大庆油田最早的开发建设,历经艰辛。

那位圆脸短发的中年女地质师,下班时,听到她哼着“勘探队员之歌”,从走廊那头走来:“是那山谷的风,吹动了我们的红旗……”二十多岁的我,看着她走出大门的背影,想,曾经在野外风餐露宿,现在扑身于一张张图纸时沉思默想,到了这个年岁,怎么激情还在心头啊!

我当过知青,学会了理发。除了给办公室男同事理,也会给几位地质师理。其中有一位地质师是上海人,少年时家住幽静的别墅街区,清华大学毕业,从克拉玛依油田过来,住进了大庆草原上的“干打垒”。理发时,他会向我这个上海小老弟,讲油田开发的趣事。他还绘声绘色地和我我讲过,在新疆戈壁沙漠上,一位地质师与吉普车女司机恋爱的浪漫故事……他后来去了中石油公司,担任专家组组长。

还有一位高个、秃顶、胡子拉碴看似严肃的地质师,是受人尊重的专家。他有时踱着方步,慢悠悠地走进我们办公室,用家

乡四川话讲幽默的段子,常引得我们开怀大笑……从他们口中,我知道了大庆有一位中瑞混血的地质师,叫王德民。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国医生,母亲是瑞士人,他的长相,完全像一个欧洲大帅哥,那时40来岁。他在二十多岁时,已推导出符合大庆油田实际的油井压力计算公式,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。他是当时在大庆油田唯一的“外国人”。但是,我在这幢办公公平房里,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位有点传奇色彩的地质师的身影。后来知道,他工作在一个研究机构。

有一年,在油田俱乐部大礼堂的售票处,排队买电影票。前面是七八个吵吵嚷嚷的十来岁孩子,还不时有孩子插队进来。一位高鼻梁、戴眼镜、欧洲人模样的中年男子,排在孩子后面。看到孩子越来越多,乱七八槽拥挤在小窗口前,他便说:你们要只好排队啊。声调平和,自己已然在孩子后面站着。身姿挺立,目光沉静。

没想到,在这里见到王德民了。我排在他身后,被他的举止制约和引导着,否则,早就拨开那些顽劣男孩,买了票走人。

我离开大庆后,曾在报上看到他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身份,参加了国家在北戴河组织的一次疗养。后来,还在电视上见到他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影像,仍是那样沉静的目光,那种思考的神情,我随即想到了他排队购票时的场景。



街巷 (纸本水粉) 高涵

饭,却被婉言谢绝。那时的政府干部真好,他们所做的一切,的确确实落在为农民办实事好事的行动上。

我们家和所有领到土地证的农民一样,把感恩和快乐全化为了汗水,流在了刚分到的土地上。父亲天天起早摸黑在田里劳作,母亲烧好饭送到田头地边。我当时刚上小

红高粱地里的日出

田永昌

学,下午一放学就向地里跑,帮着大人干点活。春天里播种,秋天里收获,汗水化为沉甸甸的谷穗和醉了的红高粱。

记得那是一个红高粱丰收的秋天,天还没亮,父亲就把我喊起来,推起独轮车,让我跟他一起到地里收高粱。我们家养的狗似乎也特别高兴,一路撒欢跟我们小跑到地里。父亲把红高粱一棵棵砍倒,然后又把血红血红的高粱头砍下来,把高粱秆子砍倒捆好放地里,然后把砍好的高粱头捆好搬到独

轮车上,等把独轮车装成一座小山,父亲便双手架起独轮车,吱吱扭扭地推出高粱地,我跟在父亲后边,狗儿也跟着我们,向我家的打谷场推去。

推着推着,我看见装满红高粱的独轮车的前方天空,一轮红日正从露水打湿的地平线上升起,血红血红,独轮车上装满的红高粱和汗水伴着喜悦的父亲长长的背影,映在高粱地里。此时,推着独轮车的父亲浑身光亮血红……

七十六年过去了,仍能记起儿时的情景,太阳血红,红高粱血红,光着膀子推独轮车的父亲也全身血红,那真是一幅新中国农民的幸福日出油画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日出,也是至今珍藏在我心中的最美最难忘的日出……

十日谈

我和我的祖国

责编:沈琦华

她的人生是一部丰富的戏剧。热爱生命是戏剧展开的动力,勇敢追梦是演绎让人心动的剧情。近日参加艺术家黄宗英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,与她交流的美好一直在我记忆的岛屿上苍翠。她说,“从小我没想当演员却当了演员,没想当作家却当了作家。”她从明星到作家,她的人生在时代的激流中穿越,她的人生是勇敢而美好的实践,她是一个跨界艺术家。

1941年,16岁的她主演了个人首部话剧《甜姐儿》亮相艺坛,随后她在电影《丽人行》《乌鸦与麻雀》《家》等电影中都有出色的表演。上个世纪80年代,她以报告文学《大雁情》《小木屋》等惊艳文坛。1982年,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走访了藏南藏北后,没有随团回国,无惧艰苦留在西藏,跟随生态学者徐凤翔做野外考察。她用心用情创作了三万字的报告文学《小木屋》,还随央视《小木屋》摄制组再度进入西藏拍摄纪录片。

1990年,她出任纪录片《望长城》外景主持人。年逾花甲的她与摄制组一起追随着古长城,辗转跋涉于草原和戈壁,她在不同的地形地貌中出境讲述,展现天地间的生命之美、文化之美。

上世纪90年代,我在《海上文坛》当编辑,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巧遇了宗英老师,年过六旬的她依然是我心中清俊秀美的梅表姐。年少青涩的我鼓励自己,“勇敢”地向她约稿,她答应了我的约稿,我们边走边聊,到了作协花园的门口,她给我留下了电话与住址,就这样,梅表姐就从银幕走进了我的现实生活中。

初夏的一天,我应约来到她的家里取稿,见到了她和冯亦代先生。穿着翠绿连衣裙的宗英老师在初夏的柔光里分外的美。她告诉我,她参加剧团的对外演出,“那时没人写幕间串联词,没人写

我不了解王德民的学术贡献,我的三姐夫了解,他是大庆科学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。他说:保证大庆油田稳产的注水采油法,要依靠王德民的井下采油工艺技术才能实现,他是我油田分层采油和化学驱油技术的奠基人。苍穹之上,飞翔着一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。这时我又和他提起,王德民在孩子后面排队体现出的教养。我说:有这样品行的人,他走向学术高端的路,一定是踏实的、心无旁骛的、富于道德自律的。

不久前,看到一本杂志,封面正是王德民先生,他已经88岁了。腰板挺直,精神矍铄,每天仍去办公室,进行着第四次采油新技术的研究。

我就写。”多才多艺的她就这样一路走来,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电影剧本,她写成了文学多面手。我心想着不要过多打扰他们,当我提出要告辞时,她亲和地说:“不要着急走,一起吃午饭吧。”当年的我觉得不好意思留下吃饭,还是要走。宗英老师就说:“我们家包的粽子、做的馄饨,你不吃是要后悔的……”她的话语犹如注入了魔法,果然就将我留住

爱美之心

王雪瑛

饭后,当我拿起相机给她拍照时,她从日常生活的松弛瞬间进入了艺术之美的呈现,转换得丝滑,美得自然。她坐在阳台的藤椅上,初夏的阳光氤氲在她的身上,她随手拿起一个摆件,沉浸在一种思绪中,一种情境里,我按下了快门。随后,我还与她冯亦代先生拍了合影,一个艺术家将生活与艺术融合的美留在我记忆的底片上。

“青春的节奏还在我心中跳跃,未来的蓝图依然盘旋在我的头脑……”座谈会上,赵静老师朗诵着黄宗英的散文诗,我心里叠印的是她热爱生命、勇敢追梦的形象,步入耄耋之年的她,依然沉浸在背古典诗词、学英语的快乐中。她还坚持写日记和随笔,把这些短文称为“百衲衣”,在《新民晚报》夜光杯副刊上发表。

2017年新年伊始,92岁高龄的她收获了珍贵的新年礼物:李辉选编的《黄宗英文集》四卷本,她以不同的文学体裁叙写着丰富的人生长旅中的相遇与感悟,给我们留下了个人与时代的剪影与对话。对于她,阅读与写作是永远的挚爱,长久的伴侣。她写下的是从人生体验中生长的文字,没有套路化的语言模式,带着她的个性魅力,透出水灵灵的生命气息,让我们感受来自一颗爱美之心的创造。

地质师,是一个个研究地表之下奥秘的人,他们也喜欢缤纷或者闲适的日子,只是,他们对生活的热爱,都投入到目光向下的专注里了。当年拥挤在小窗口前买电影票的孩子们,还会记得身后那位礼貌的“外国人”叔叔吗?如果真的还能想起,并且有所感悟,那会是他们的幸运。简朴的红砖平房,不知安在否?已经很多年未见的地质师们,他们的年龄都比王德民院士要稍大一些,我在遥远的江南,向他们送去祝福。

有一次,我在逛本地一家旧书店的时候,被一本装帧精美的童书吸引,是凡尔纳的《神秘岛》。封面上各种海洋生物,如海马、玳瑁、波龙,还有大螃蟹、大贝壳、深海鱼类等,都用装饰花纹缠绕在一起,形成一个边框。书已经有些自然旧了,那是时光赋予这本书的独特印记。我倒是蛮喜欢这书自然变旧的质感。

旧书旧时光

赵玉龙

把它握在手里,仿佛有一种和旧时光发生触碰的陌生感和新鲜感。翻开封面,看到扉页上有两行笔触略显稚嫩的留言,是写下这字的人送给他的一个好友的:“小时候的时光是多么令人怀念,曾经一次又一次在梦中出现你灿烂的笑容,这本书,权作我的一片心意。”落款是:老友,xx,2001年,4月29日。

我不知道这本书的主人当时几岁模样,我猜想他或许是个高中生,或者是刚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。他是不是用第一笔工资买了这本书送人呢?也不知道这书他后来是送给了谁。但仅仅因为这句寄语,便让我感受到了这是一份属于少年时代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独特真情。只是遗憾,这本书后来还是来到了这家旧书店里,甚至还蒙了灰尘。我像是从海滩边捡到了珍珠一般惊喜地发现了它。当我揩去封面上蒙的灰后,我便成为了这本书新的主人。

我想,我选择买下这本书,不光光是因为这本书本身,或许,更多的是因为那样真诚美好的一句寄语吧。这寄语,就像太宰治《人间失格》里的一句话一样:“恰如绿叶掩映的瀑布般赏心悦目。”

